

傳記文學叢刊

細說三國

上冊

黎東方著

細說三國

上冊

黎東方著

傳記文學叢刊之四十四

細說三國 總目錄

上冊

- 寫在「細說三國」之前……………一
- 一 合久必分……………九
- 二 黃巾……………一五
- 三 董卓……………二一
- 四 呂布……………四七
- 五 袁術……………六一
- 六 公孫瓚……………六九

七	陶謙	七九
八	早期的劉備	八五
九	袁曹之戰	一一五
一〇	烏桓	一三七
一一	公孫度	一四一
一二	公孫康	一四五
一三	公孫淵	一四九
一四	孫策	一五三
一五	孫權	一七五
一六	諸葛亮	一九七
一七	赤壁	二一一
一八	孫夫人	二三九
一九	荊州問題	二四五

下冊

二〇	益州易手·····	二五七
二一	曹操收降張魯·····	二八一
二二	劉備攻取漢中·····	二九一
二三	劉備稱王·····	二九五
二四	孫劉翻臉·····	三〇一
二五	漢吳同盟·····	三一七
二六	諸葛亮北伐·····	三二九
二七	諸葛亮的爲人·····	三五三
二八	蔣琬·····	三七七
二九	費禕·····	三八九
三〇	從董允到樊建·····	三九三
三一	曹家的事·····	三九九

三二	孫家的事	四三三
三三	劉家的事	四四五
三四	司馬懿	四五一
三五	司馬師	四七七
三六	司馬昭	四八三
三七	姜維	四九一
三八	分久必合	四九九

寫在「細說三國」之前

聯副主編要我當年在重慶「開講三國」的經過，向聯副的年輕一代讀者說一說。我真有點不好意思。怕說得太多了，叫人難以相信。所以，我只想輕描淡寫一下。當年在重慶捧過我的場，而今日在臺灣的，人數不在五千以下；我很感謝他們，因為他們到今天還在背後捧我，見面的時候鼓勵我。他們甚至「加油添醋」，給了我不少我無權接受的榮譽。例如，說我講了「紅樓夢」，又說我是中國最早的一位演講賣票的人。

「紅樓夢」我只在成都華西壩金陵女子大學講過一次，但沒有賣票。在重慶公開講「紅樓夢」而賣票的，不是我，而是中國共產黨所捧出來的一位高語罕。高語罕曾經在黃埔軍校，周恩來代理政治部主任之時，當過教官之類的職務。他對馬克思主義知道不多，對紅樓夢知道得更少；他僅僅從所謂唯物史觀的觀點，給紅樓夢中的人物，一一戴上什麼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無產階級，等等非驢非馬的帽子。中共捧他出來，原是要想給我一點顏色看，和我比，看誰的聽眾多，而不在于票房的收入。結果，來聽的僅有五六十人，而多數是拿了免費的招待券入場的。

在中國最先以賣票的方式演講的，不是我；而是戰前在北平的一位名教授周炳琳。他所講的是政治問題。在重慶最先以賣票方式演講的，似乎是我。但是，龔德柏先生說，是他。大概是他。也許還是我。記不清了。

在外國首先賣票演講的，可能是馬克·吐溫 (Mark Twain)。也許是另一人。讓將來的有心人，以這個題目寫一篇博士論文罷。

我開始講三國的一天，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一連講了十天。地點是在重慶、中一路、黃家垭口、山東省立實驗劇院。為什麼要在實驗劇院？因為，院長王泊生是我的好友，（也是當時名叫藍蘋，其後名叫江青的一位女演員的老師）；王泊生把該院的大禮堂借給我，不收場租。

為什麼要講十天？因為，一天講不完。說書人講三國，講上一兩年，也每每講不完。十天，只不過是把九十六年的大事與若干值得一談的小事，濃縮了又濃縮，給聽眾提供一個提綱挈領的敘述而已。十天的講題，每天換一個，第一天是「合久必分」，第二天是「董卓」，第十天是「分久必合」。

根本，為什麼要講？為什麼要賣票？為什麼不講別的，偏要講三國？為什麼要講？是爲了賣票。不是爲了講而賣票，是爲了賣票而講。爲什麼要賣票？因爲窮。爲什麼窮？因爲通貨膨脹。戰前，我的一個月薪水，可以買一百雙皮鞋，或四十擔米。到了民國三十三年，我的一份專任薪水只買得了一雙皮鞋。買了皮鞋，便無錢買米。這都是被日本人害的。日本人定要侵略我們，我們的政府不得不率領全國同胞起而抵抗。抵抗了七年，民窮財盡；抽不到多少稅，又借不到多少外債，只好印鈔票。鈔

票越印越多，物價就越來越高。於是，我兼了三個大學的課；太太作了王泊生那裏的國文科主任，一家七口，依然活得十分吃力。

有一天晚上，太太在「大樑子」(?) 劇院的課堂教完了一天的書，擠上公共汽車回到兩路口，我們的家，菜色的臉上添了一層灰白。我突然想起了古書上「窮則變，變則通」那一句話，向太太陳述我的「求變」之意：「這樣下去不行。你會累死。」她說，「你也會累死。那有你這種步行七十里，走到沙坪壩兼課的教授？看你的臉！黑一塊，青一塊，當年白裏透紅的清華少年跑到那裏去了？」(事實上，我去沙坪壩中央大學，不僅步行，而且要爬過一座「金剛坡」高山；陪我爬的是其後頗享盛名的畫家傅抱石。我不是不喜歡乘長途汽車，而是鐘點費減去車費，便所剩無幾，失掉了兼課的意義；因此才捨車而步。)

我向太太說：「就請你再看一看我這個既黑且青的臉龐。看看我能否轉運？能否改行？」她果然認真的看了看，說：「看不出有什麼特點呢？改行做生意，必須鼻子大，你的鼻子雖不算小，然而鼻孔太露，不聚財！你啊！只是會說話而已，你就死心塌地、吃一輩子教書的飯罷。」

這真是，「知夫莫若妻」。我直到其時為止，不曾覺察到自己竟有說話的一技之長。我得意之餘，向她說：「我能說話就好。該吃開口飯；而不必一定吃教書的飯。說書，不也是很好麼？」

母親立刻表露了她的興趣。她說：「說書的人吃得好。我小時候，鄰舍住了一個說書的。他家裏天天買肉吃呢。在我們清朝時候，教書的人也窮。可憐的顧老師，過年過節，才買一斤半斤的肉。顧

師娘苦了一輩子呢。」（顧老師是我母親小時候的另一鄰居。）

太太說：「說書也得有本事啊。你能說什麼呢？對啦！前幾天有一場電影，演的是美國馬克·吐溫的故事。馬克·吐溫辦印刷廠，破產；異想天開，講演，賣門票，竟然還了債，又賺了不少錢，並且環遊世界，作了旅行演講。我看，你也不必轉說書的念頭了。就試試演講賣票罷。」

我說：「好罷。不管能不能賺錢，作一個中國的馬克·吐溫，也好。但是，講什麼呢？先秦史，只好講給中央大學歷史系的學生聽。希臘羅馬史，到希臘去講，到意大利去講。咱們人在四川，該講一些四川人喜歡聽的東西。四川的歷史？對了！不妨擺擺四川人最愛擺的龍門陣。（擺龍門陣的意思，是閒談、亂蓋，也可以包括一點講古。）我來擺三國。劉先主的廟，在成都。張翼德的頭，在夔府。諸葛亮的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因此，我就決定以演講三國為「入世之媒」，為新的謀生之道。說來慚愧，我對三國這一短暫時期的歷史，並無了不起的研究，只是與極多和我同時代的男性讀書人一樣，自幼便瀏覽了三國演義幾遍，其後也涉獵了三國志與資治通鑑等幾部「正經書」，對演義中的若干說法獲得若干「折衷」，如此而已。我佔便宜的地方是：曾經在戰前作了一番相當仔細的筆記，也於抗戰開始以後先後在西安的東北大學與成都的中央軍校，講過「三國戰史」。於是，在實驗劇院登臺以後，竟然能夠說得頭頭是道、津津有味，不僅糾正了三國演義，也大膽檢討了平劇之中的若干有關三國的戲。我認為：孔明的年紀比周瑜小，孔明不該作老生，周瑜不該作小生，等等。

值得同情與欽佩的戰時教授如我，有了免費的場子，却沒有現款去登報上的廣告，與印刷入場的票。好心的中央日報社同仁，特許我先登廣告，後收廣告費。印刷公司，也讓我先印入場的票，後收印刷費。在門口賣票、收票的，是幾位富有活力的忘年之交，他們純盡義務，不收報酬。

沒想到，一砲打響，窮人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第一天，便來了三百多人。每人的門票是國幣四十元（當時美金一元的官價，是國幣二十元）。一連十天，總收入相當於我的教授薪水幾十個月。

其後，重慶近郊化龍橋的熱心人士，邀我去作了一串演講，重慶下半城的民衆也邀我到都郵街附近的合作會堂，講了一串。這兩串，我都只講了五天。一方面，我似乎覺得錢賺得太多，會遭造物者之忌；一方面，也確是精力有所不及。天天晚上站在那裏，一口氣指手劃腳，說上兩個多鐘點，一連五天已經够辛苦的了。（第一串，能講十天，是因為在下午講；並且當時頗有點要錢不要命的決心。）

再其後，到了瀘州、昆明，每每只講三天，分別以曹操、孫權、諸葛亮爲主題。三天的收入，當然不比十天的多。於是，我又添了唐朝與清朝兩個「戲碼」。唐朝的三個主題，是唐太宗、武則天、唐明皇。清朝的三個主題，是：康雍乾，太平天國，慈禧。有時候，專講太平天國，便以洪秀全、石達開、曾國藩三個人爲主題。（中共的重慶新華日報在某一天曾經用了副刊的全張篇幅，批評我的演講，說「國民黨政府」不應該讓黎東方公開散佈擁護曾國藩，反對洪秀全的論調。其實，我對曾洪二人並未作主觀的左右袒。）

勝利以後，我在南京、貴陽、安順也講了幾次，在貴陽與安順的活動，最爲重要；否則，我沒有錢「包機」，全家也就必然陷在大陸，受毛匪的磨折。在長沙變色之時，我尚在貴州大學教書，預感到貴州將爲湖南之繼，就走到公路局買都勻的汽車票。公路局的人說：「沒有票了。要不要把你的名字寫下，列入候車人的名單？不過，候上半年，也輪不到你呢。」我又走到中國航空公司的辦事處。航空公司的人也說：「要不要列入候機人的名單？候上半年，也輪不到你呢。」這一位航空公司的人，以半幽默、半諷刺的口吻說：「黎先生，你若有錢包一架飛機；倒是今天你付錢，明後天便有機。」我說：「真的麼？」他說：「真，倒是真的。因爲包機是加班，不受客票先後的限制。」我說：「好。我籌足了錢，就來付包機的費用。」

包機的費用，相當於二十四張來回票，也就是四十八張飛機票的票價。（飛機上只有二十四個座位。去香港，我包；由香港回來，據他們說是「放空」。）這四十八張飛機票的錢，我在兩三個禮拜以後用九百六十張的講演票的錢付清了。航空公司的高級職員，向我道賀，同時一再解釋，某職員向我建議包機之時，並無看不起我之意。他說：「的確，全國還不曾有一位教授用自己的錢包過敝公司的飛機。您比胡適之有辦法得多了。」我說：「那裏，那裏！胡先生才真有辦法呢。政府派了一架專機，到北平去接他出險，像我這樣的黨內名流，是「自己人」，不好意思等待政府來爭取，應該「自力更生」。不過，我所花的却也不能算是自己的錢呢。是熱心於聽我演講的，成千的可愛可感的聽衆的錢呢。」

爲了報答這些可愛可感的貴陽聽衆，我特別破例寫了簡要的講辭大綱，每天印了一張報紙，摺起來，成爲十六開的薄薄的一本「分冊」，題爲「新三國」，定價每分冊銀圓五分，一共有六個分冊。這「新三國」，其後在舊金山與檳榔嶼（庇能）均重印了一次。吳俊升先生交了一部給浦家麟先生，於是遠東圖書公司也發行了臺北版。

現在，由於聯副主編的鼓勵，我開始用「細說」的體裁，寫「細說三國」以就正於臺北及自由世界各地的讀者諸君。這細說體裁的三國，應該與演義不同，也與「新三國」不同。它將與「細說清朝」、「細說明朝」、「細說元朝」等等成爲姊妹篇。倘若「細說清朝」已蒙萬千讀者諒許爲可讀性頗高，則這部「細說三國」的可讀性，有希望不比「細說清朝」差。因爲，三國人物的本身，就比清朝的所有人物更富於傳奇色彩。

我是一個大愚若智的作家。有人說我「聰明絕頂」；其實我是笨到極點的人，只是外表略帶秀氣而已。有許多事情我想不通，有許多道理我弄不明白，有許多句子我寫不順。我只是懂得，像我這樣的笨人，惟有埋頭苦幹才能得救，惟有把句子一改再改，才念得順，惟有把寫成的文章一段一段的刪，一篇一篇的撕了重寫，才勉強敢拿出去。我這個文章「厨子」，所做出來的菜未必色香味俱備，但區區微衷，很希望讀者諸君吃了容易消化。

這部「細說三國」，不是「三國演義」或陳壽的「三國志」的修訂本，也不是裴松之的「三國志注」的改編。這三部書各有千秋，非不才如我所能改動。

民國時代的盧弼，編了一部「三國志集解」，堪稱爲我們之中的裴松之的耐心，抄錄了不少裴松之以後的雪泥鴻爪。呂思勉、祝秀俠，與姚季農、李則芬，四位先生也都作了或多或少的貢獻。

對三國志貢獻最大的，直至今日爲止，恐怕依然是後漢書的作者范曄，與資治通鑑及考異的編者司馬光。我的法寶，也就是這幾部書而已，不惜對讀者「和盤托出」，爲的是，讓後起之秀能够寫出比這「細說三國」更好的書。此外，碑銘，地方志，有關各人的文集詩集，與當代各方學者的短篇論文，也都是我的法寶，乘此一併公開。

正如以前寫「細說清朝」之時一樣，我誠心懇求讀者諸君隨時寫信對我指教，我一定參照諸君的寶貴意見，於將來印行單行本之時一一加以改正。

一 合久必分

西洋人談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繼起的說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潰，另一文化誕生的說法。湯恩比 (A. Toynbee) 與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社會」一詞，代替「民族」或「文化」，並且補充了一點：某一社會崩潰之後，其構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會所局部保存。湯恩比喜歡說，「中國社會」在佛教進入之時已經崩潰，此後不再有中國社會，而只有「遠東社會」。

我們中國人談中國史，常常說「一治一亂」，而不說周族衰亡，漢族繼起。因為，所謂漢族，並非如日爾曼民族之爲侵入西歐的蠻人，而是包括了周朝老百姓的一個民族，只不過是國號改用了「漢」而已。

在實質上，中國史與西洋史不同。我們的周朝，十分燦爛，却不是曇花一現的希臘；我們的漢朝，十分雄偉，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復興的羅馬。我們中國人具有西洋人所沒有的韌性，我們的朝代雖有興亡，國勢雖有盛衰，而我們的民族自從埃及、巴比倫之時便一直屹立於東亞，不曾死亡，而且繼續發展。

我們的政府有時候好，有時候不好。政府好的時候，是治；政府不好的時候，是亂。治久了以後，難免有亂；亂了一陣以後，由於我們這個韌性的民族「江山代有才人出」，由於我們這禮義之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所以遲早會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作成非常之事：「撥亂反治」。於是，希臘羅馬於亂了以後未能再治。而我們中國每逢「天下大亂」以後，不久便「形勢大好」，一治一亂，成了中國歷史的軌跡，雖則我們不可把這軌跡看得太呆板。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或其修訂人毛宗崗，說出一句令人難以駁倒的話：「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等於說：「治久必亂，亂久必治。」這種話，西洋人說不出來。他們對於他們國家的未來，不可能有如此樂觀的信心。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八個字，與宇宙論中「一張一弛」的大道理，頗能相通，站在嚴格的歷史科學的立場來說，分與合至少是極可能的趨勢：「合久會分，分久會合。」

至於，合久了何以不僅會分，而真的分了，以及分久了何以不僅會合，而真的合了？「人」的關係很大。位據要津的人，倘若有決心與能力，是可以挽狂瀾於既倒的；倘若沒有決心，又沒有能力，那末，便常常把好的局面弄糟。

兩漢的大一統局面，維持了四百多年；種種機構已經磨損、腐蝕，不再管用。分的趨勢，確已形成，外戚宦官之輪流把持中央，剝削地方，是病徵，而不是病源。

病的本身，差不多已到了無藥可救的階段。打外戚，除宦官，只是治標而已，治不了本。是所謂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不是培元固本，滋陰補陽。

西漢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是由於劉邦簡化了法律，減輕了賦稅，因襲了秦的「三權分工」的制度，加上武帝以後之徵用全國各地的人才，提倡以孔子學說為中心的學術。

所謂「三權分工」，是丞相與太尉分治文武之事，御史大夫專管監察之事。這與美國的「三權分立」不同。在沒有三權分立之時，這「三權分工」究竟要遠優於霍光以後之權臣包攬一切了。

所謂徵用全國各地人才，是下令每郡每國保送「孝廉」，由皇帝加以選拔，留在身邊訓練，察看，然後再分別任用為縣令、縣長，於任期完滿以後加以升降。最好的，能被逐漸升為中央的九卿（部長），三公（院長）。

霍光在昭帝之時，作「大司馬、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是虛銜（加官），大將軍在平時沒有多少兵。他掌握大權，由於替皇帝「錄尚書事」。尚書原是宮內的小官，在皇帝身邊管文書。霍光以宮外的大官的身分，「錄」起皇帝的所有的文書事務來，這就成為丞相與太尉及御史大夫之上的，皇帝之下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實上的皇帝。

三權集中於一人之手，三權分工的制度，不再存在。用淺顯的話來說，霍光替皇帝代閱公文，代批公文。丞相等人的奏章，雖則是寫給皇帝的；事實上皇帝一概不管，都由霍光處理。

霍光以後的外戚如王莽、竇憲、鄧騭、閻顯、梁商、梁冀、竇武、何進，都於種種不同的加官與虛銜之下，大權獨攬，宦官的領袖們，有時候大權獨攬，有時候幾個人合夥，作「集體領導」，如單